

黄政文

## 危机时代的理性主义者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中的胡塞尔形象

**摘要：**《反思的使命》两卷本详细论述了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生平思想史以及思想交互史。作者未陷于史料堆砌之中，《反思》一书中横贯着一种同一的胡塞尔形象，该形象与其思想内在的多重性并不相悖。本文认为，此种“同一的胡塞尔形象”或许可以陈述为一种“危机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即：胡塞尔身处知识转型的关键期，其思想一方面具备了多样性、转型性乃至改革性；一方面胡塞尔自觉地在“危机中坚持理性与反思”，与各类非理性主义保持距离。本文将具体分析《反思》一书是如何描述这一胡塞尔形象的。

**Zusammenfassung:** Das zweibändige Werk *Die Mission der Reflexion* bietet eine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 sowohl der lebens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als auch der intersubjektiven Denkgenealogie des Phänomenologen Edmund Husserl. Der Autor verfängt sich dabei nicht in einer bloßen Aufzählung historischer Materialien; vielmehr durchzieht das Werk ein einheitliches Bild Husserls, das sich nicht in Widerspruch zur inhärenten Vielgestaltigkeit seines Denkens setzt. Diese Studie vertritt die These, dass dieses „einheitliche Husserl-Bild“ als das eines „Rationalisten im Zeitalter der Krise“ beschrieben werden kann: Husserl befand sich in einer epistemischen Umbruchzeit, in der sein Denken einerseits pluralistisch, transformativ und reformorientiert geprägt ist, andererseits aber durch eine bewusste Beharrung auf Rationalität und reflexiver Verantwortung gegenüber der Krise charakterisiert wird. Der vorliegende Beitrag analysiert exemplarisch, auf welche Weise *Die Mission der Reflexion* diese spezifische Husserl-Gestalt phänomenologisch rekonstruierbar macht.

**Abstract:** The two-volume work *The Mission of Reflection* offer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the phenomenologist Edmund Husserl, as well a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terrelations within his thought. The author does not become entangled in a mer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ather, a coherent image of Husserl runs throughout the book—one that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intrinsic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f his thinking.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a “unified image of Husserl”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that of a “rationalist in an age of crisis”: situated at a pivotal moment of epistemic transformation, Husserl’s thought is marked, on the one hand, by diversity, transformation, and even reform; and on the other, by a deliberate insistence on reason and reflection in the face of crisis, maintaining a critical distance from various forms of irrationalism.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in detail how *The Mission of Reflection* constructs and conveys this particular figure of Husserl.

**Keywords:** 《反思的使命》，胡塞尔，现象学，理性主义，危机时代

《反思的使命》是倪梁康教授为埃德蒙德·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所写下的长篇思想传记。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样一种关于胡塞尔的详尽评注是长期缺失的。<sup>1</sup> 不过通过阅读本书序言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写作此书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填充学术空白的创新冲动，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使命”。

作者被胡塞尔哲学所主动承担的“人类反思与自身完善”的使命所打动和感召，于是他本人也获得了某种使命感，促使他要把胡塞尔的使命在当今时代被“理解和宣示”。作者强调，要对一个哲学家的使命进行“再理解”，不仅仅需要阅读他的文本和手稿，还要详细呈现他的人生经历、生活情景以及思考历程，即通过把握哲学家本人生命历程的整体性而获得——这种写作方法也正符合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

---

<sup>1</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24年，序曲，第3页。

于是在哲学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要求下,《反思的使命》两卷本的基本框架被确定下来。在第一卷中,胡塞尔的生平按照年代顺序来进行论述,教育求学、写作发表、社会交际、演讲授课等“身体性”的经历构成了“故事线”的基本时间轴;同时,这时间轴里穿插着胡塞尔人生不同时期所对应的公开著作以及重要手稿的集中评论,这些评论被作者称为胡塞尔的“心灵表达史”和“心灵独白史”。<sup>2</sup>

而在第二卷,作者同样兼顾了身体和心灵两方面,不过故事的论述线索却不是按照时间展开的,而是围绕胡塞尔与他人的关系,进行了一种“主题性”的排列。在这里,作者在给出胡塞尔与某位师友、弟子或同代人的交往历史的同时,也同时论述了胡塞尔对于某一项哲学主题的思考。通过按照这样的编排,《反思的使命》不仅是可靠而丰富的,还避免了因论证冗长而出现的枯燥与单调,成为一部可阅读、可理解的思想性文本。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胡塞尔生平材料的简单排列,而是一种连贯的胡塞尔形象:一位不断探索人类知识基础和人的自我结构的反思者,一位危机时代的理性主义者。

### 一、《反思的使命》中胡塞尔的多重面孔

胡塞尔的公众形象可能是略显单一的:他的肖像和他的哲学一样严肃,他的人生轨迹和他的哲学态度一样传统;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建立起了令人兴奋的新的哲学方法,他的弟子们受益现象学方法极大的开阔了哲学的讨论空间,他自己始终却着迷于纯粹现象学与纯粹哲学的问题。

但是对于更进一步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从事者而言,胡塞尔又有着斑斓繁多的侧影,以至于这些侧影有时候似乎很难指向同一个胡塞尔形象。胡塞尔的社交和兴趣是广阔的,他和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这个时间段里欧洲几乎所有的知识圈子都有交际:纯粹数学、应用数学、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科学史……胡塞尔的哲学论题是丰富多彩的:命题判断、代现理论、直观性、主观经验感受、先验自我、柏拉图主义、意识哲学、身体理论、主

<sup>2</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序曲,第9页。

观时间与科学时间、主体间性与主体间交互、生活世界、历史目的论、价值哲学与实践理性……而且，胡塞尔不仅仅热衷于在现象学的地基上搭建起层台累榭，他还往往回深挖并重构现象学的地基，<sup>3</sup>这就使得在我们在一开始获得的比较稳定的印象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反思的使命》将胡塞尔人生与学术的各种侧面仔细盘点，<sup>4</sup>却也并没有迷失在胡塞尔人生和思想的“赫拉克利特之流”<sup>5</sup>中，以至于让胡塞尔的形象难以索解。作者表明，胡塞尔思想的多元性可以同一在一种具备一致性的学术理想之中。

《反思的使命》详尽地对胡塞尔的社交脉络、胡塞尔对时代议题的思考以及其与同时代人的时空交织加以整理。首先是胡塞尔素未谋面而在广义的时空中交集的“老乡们”：作家弗兰茨·卡夫卡，数学家－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遗传学家格里戈尔·孟德尔，音乐学家古斯塔夫·马勒。<sup>6</sup>这些“危机时代”的精神代表们和埃德蒙德·胡塞尔一起，勾勒出20世纪初期人类知识发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知识的多元化中深入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中未被探索的底层，在各个领域种开创一种前任未曾设想的新范式。正如欧根·芬克所言：胡塞尔现象学不仅仅是讨论意识奠基作用的合法性哲学，而是为人类丰富多样的具体知识找到一个基础的具体性－根源性哲学。<sup>7</sup>合法性哲学把意识和逻辑作为哲学的主要主题；而在胡塞尔哲学中，意识和逻辑的奠基作用是其讨论具体世界的起点，自我的特殊性在于其是世界本身丰富性的“伴随”与承载。<sup>8</sup>

3 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靳希平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3页。

4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990页。

5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附录二，第433页。

6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11页。

7 “胡塞尔的问题不是康德的问题；康德提出的是客观的可能意识的正当性的问题……胡塞尔的问题则是世界根源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包含在神话、宗教、神学、本体论中的问题……因此现象学还原是摆脱了自然态度的限制的主体自身的一种转化，作为世界的部分隐存于自身之中的主体被发现为世界之基础。”参见：Eugen Fink, *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1930-1939*,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Netherlands : Springer Dordrecht, 1966, 180-223.

8 参见胡塞尔对于纯粹自我的讨论。“纯粹自我必定能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纯粹自我可以进入任何未曾实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不意识的、未苏醒的）意向体验。”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接着是胡塞尔求学年代与在哈勒担任私人教师年代的师长与好友们，其中有老师卡尔·魏尔斯特拉斯（严格化微积分的创始人）、老师弗兰茨·布伦塔诺（在哲学和心理学中重新引入了意向性理论）、老师卡尔·施通普夫（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好友格奥尔格·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与数学公理化系统的创始人）、长辈物理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笔友戈特洛布·弗雷格（分析哲学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胡塞尔本人也受到它们的影响，辗转于数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诸多知识领域。

胡塞尔的早期思想涓流，在胡塞尔哈勒时期一齐汇入了《逻辑研究》这条大河里。一方面，接受数学教育和逻辑学教育的胡塞尔，要通过逻辑研究的努力，通过在逻辑意识中、在逻辑思维的体验联系中进行的意义给予或认识成就的回复，澄清纯粹的逻辑学观念。另一方面，胡塞尔的“逻辑学”不是一门与人类无关的形式化学科，而正是“人类精神本身”<sup>9</sup>。通过反驳逻辑的心理主义，反驳过度的怀疑论，<sup>10</sup> 人类精神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重新得到确定，意向性中得到认识的纯粹观念也具备了超越论性。<sup>11</sup>

而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通过反驳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胡塞尔进一步和各种类型的相对性哲学划清界限，恢复了真理性和有序性的地位。<sup>12</sup> 笛卡尔曾经在他的时代以“有序的”哲思者作为其沉思对话的基本前提对象，这种理想在19世纪以来被否定乃至视为危险，而胡塞尔恢复了这种理性原则。<sup>13</sup> 理性心灵天然地是接受现象的载体，而当心理主义把心灵活动简单还原为一种客观主义和生理-心理的机械运作，<sup>14</sup> 当历史主义简单地把洞见取消为一种均值的相对意见之后，理性心灵就将失去合法性，哲学便倒向一种过度的主观主义：主体不再能宣称自己看

9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86页。

10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90页。

11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93页。

12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296页。

13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295页。

14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节。

见了事物本身，而只能受困于心理 – 历史自我所提供的表象。<sup>15</sup> 而当胡塞尔反驳了心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等相对主义变种、使得人们重新确立对有序性和真理性的信心之后，实际上胡塞尔不是在恢复某种自大的心理主体，而是恢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自信。如此一来，观看人类精神本身与“事物本身”的眼睛便被重新激活了，人类体验和原初的被给予性获得了稳固的地基，而在这地基之上获得的人类理解将会是直观的、清楚明白的——而这一事业正是笛卡尔所期盼开创的。理性在一个新的地基上，结合着丰富的被给予方式的多样性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哲学的真正成就就必定在于：它回溯到最终的起源上，它通过哲学直观，即哲学的本质把握，无须推理和证明的辅助，借助于直接的看而获得大量最为严格奠基性认识。”<sup>16</sup>

## 二、胡塞尔多面性中的同一

先从多样性出发，而后自如地被胡塞尔自身的视野发挥权能性统摄为一：时代先声 – 知识变迁 – 思想汇集 – 著作现身……这一布局的好处，用作者本人在后记中援引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不是迷失在伟大哲学形成于历史的发展联系之中……而是按其本己的精神内涵来对我们产生推动作用……如果我们能够观入这些历史上的哲学之中，能够深入到它们的词语和理论的灵魂之中，那么就会有哲学的生命连同整个活的动机的财富和力量从它们那里涌向我们。”<sup>17</sup>

《反思》第一卷全书都延续了这一谋篇布局。例如，在第一卷的收尾部分（“弗莱堡退休后的岁月”），同样的结构继续发挥着作用。作者通过胡塞尔圈子中的多方描述、演讲稿、手稿书信往来（资料、历史、观点），刻画了一个终身保持“反思”性的胡塞尔形象，这种反思使得胡塞尔毕生都在理性的指引下不断地进行自我挑战和自我调整（理性的统一性）。<sup>18</sup> 例如，作者在关于胡塞尔的七十岁生日宴会的材料整理中，在文

<sup>15</sup>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第 69 节。

<sup>16</sup>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第 92 页。

<sup>17</sup> 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第 97 节。

<sup>18</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后记。

末特别提到了胡塞尔对其早年恩师魏尔斯特拉斯的强调，表明了胡塞尔对于严格论证的着迷、对于“用纯朴的、但对无成见者来说绝对明晰的、不再给模糊性留下空间的考察”来论述哲学、对“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等现象学理想的一贯坚持。

这一描写还进一步呼应了作者此前对于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一理想的讨论。“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的、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sup>19</sup>作者认为胡塞尔一生从未放弃过这个哲学观。曾经有一些观点认为后期胡塞尔似乎放弃了这种哲学理想，而作者借助更全面的胡塞尔后期书信以及伽达默尔、朗姆贝克等学者的考证得出结论：胡塞尔《危机》笔记中关于“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一梦已经破碎”的这种表述并非他本人所言，而是在引述当时的流行观点；而他对于哲学奠基性的坚持态度在与他人书信一再坚持哲学的奠基性：“借助超越论现象学……实现一门作为普全科学的哲学的观念。”<sup>20</sup>

胡塞尔式理性主义的丰富 – 同一结构持续地展示他的魅力。借助与人类学家列维 – 布留尔的通信，胡塞尔表达了人类学与生活世界现象学的共鸣性。胡塞尔不是简单粗暴的把布留尔的人类学体系塞入自己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之中，而是从布留尔“作品本身”出发，高度评价了布留尔“关于人类学的事实”的科学，“作为各种民族心理学之总和的人类精神科学”，认为布留尔处理了复数的、具体化的民族心理学和人类精神。但是，胡塞尔的博学眼光从中看出了一种“超理性主义”的共鸣可能，看到了一种摆脱旧有理性主义，抵抗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可能性。<sup>21</sup>正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才宣称在布留尔人类学之中找到了类似于超越论现象学的结构，并视布留尔为知己，宣称他完成了自己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提纲。之后不久，胡塞尔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最后出版物《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作者敏锐地援引 E · 米尔曼对《危机》的评论来强调：胡塞尔的危机意识是对时代危机的敏锐察觉，但是在更根本

19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 294 页。

20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 295 页。

21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 784 页。

的意义上,《危机》是胡塞尔一以贯之的理性意识对人类知识总体上的不稳定性的风险预警。

《危机》的历史是切切实实的人类知识史,胡塞尔没有在讨论某种历史神话与历史寓言,胡塞尔关切的是真实的科学史问题。胡塞尔在《危机》中指出,现代科学区别于传统科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它追求一种语言来描述和给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观念对象性的无限的总体,一种真正的无限性。在这种追求中所出现的“关于一种合理的无限的存在整体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整体的合理的科学的这种理念”的构想,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物,一种杰出的成就。<sup>22</sup>这种构想最后通过由伽利略奠基的数学语言而被实现,伽利略通过把自然数学化,把实体转化为形状、把形状转化为“测量”,而使得数学语言可被用于对世界的整体描述,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描述自然的唯一语言。不过,这种成就的另一面正是“危机”,因为除却“形状”,自然中还存在着“充实”,充实无法被直接转化为形状而只能间接转化——然而数学对于充实性只能采取间接描述这一缺点,在现代“科学繁荣”的迷惑下遭到了无视,<sup>23</sup>以至于关于“质”的哲学被“量”的哲学所压制和贬低。

胡塞尔认为这种第一性对第二性的压制、和对这种压制的不自觉反对构成了伽利略以来的现代哲学的论述主轴。而现象学正是作为一种试图全面恢复“质的哲学”的地位的运动而登上历史舞台。一旦人们遗忘了不可被量化的“质”的重要性,也会遗忘直观、判断力以及原初体验的重要性,那么哲学的明晰性和哲学洞见也会随着失去奠基。所以,胡塞尔论述现象学作为应对科学危机的哲学,不是因为胡塞尔把现象学看成某种科学哲学,而是因为现象学始终是一种“人的哲学”。<sup>24</sup>正如作者所强调:胡塞尔的历史意识根本上又是现象学的而非单纯历史学的:胡塞尔要为人类知识谋求主观性依据,他在为了人类的知识谋求意义而斗争着。<sup>25</sup>

22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4-36页。

2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8页。

24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802页。扎哈维在胡塞尔哲学中也找到了一种始终的实践性动机,一种负责与自我负责的动机,参见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忠伟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93页。

25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798页。

### 三、胡塞尔哲学的时代交锋

《反思的使命》第二卷“胡塞尔与他人的交互思想史”中，胡塞尔的形象则更多是通过与他人思想的直接对比，在交流和交锋中碰撞得到彰显的。

在第二十一章“胡塞尔与柏拉图：现象学与观念论”中，胡塞尔表现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柏拉图主义者：胡塞尔批判性地继承并改良柏拉图的观念论。数学出身的哲学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持一种柏拉图主义立场，胡塞尔式柏拉图主义可贵的地方是没有被柏拉图观念论中的形而上学观念实在主义影响。作者在两方面强调一方面：胡塞尔通过回溯柏拉图“*iδέα*”概念中“观看”的含义，把实在论观念还原为“观念直观（Ideation）”、“观念化抽象（ideierende Abstraktion）”与“本质直观（Wesensschau）”等具体的现象学操作从而摆脱了观念论的本体论弊病；<sup>26</sup>于另一方面，胡塞尔把观念论理解为“观念和同一”，一条延绵的线，在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上涌动的“纵意向性”，这条延绵之线远离每一种先天本体主义，具备着发生学和历史性维度。<sup>27</sup>在合理地反思、改良了观念论之后，胡塞尔还保留了柏拉图主义的理性遗产：对“观念”的追求意味着对正确认识、对“逻辑”、对客观科学的接近；“纯粹合乎理性的精确规定”的思维方式始终是经验的测量标准。<sup>28</sup>对于严格规定下的本质的可显现性的追求，使得胡塞尔的观念论区别于本体论意味与神学意味的观念论理解，而远离了倒向神秘主义的可能。

《反思》第二卷第三十一章“胡塞尔与哥德尔”也强调了胡塞尔现象学与神秘主义解释之间的距离。哥德尔多次谈及一种宗教式的“顿悟”体验，并认为胡塞尔也经历了这种顿悟式的决定性时刻，而倪梁康教授认为，胡塞尔哲学中的“领悟”与宗教体验是分开的，是一种理智推演的知性直观，或者一种经历系统学习之后的认知转变过程。“将胡塞尔的

<sup>26</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647页。

<sup>27</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654页。

<sup>28</sup>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656页。

观念直观的明见、明证理解为某种一劳永逸的、颠覆性的‘突然开悟’，是一种可能会误入歧途的想法。”<sup>29</sup>进一步，作者提出如果要在现象学角度认真分析“顿悟”何为的话，也只能把顿悟体验作为一种“感觉(Sinn/sense)”来分析，而不能把顿悟作为一种身体意味的“第六感官”，因为胡塞尔现象学以及观念直观的方法，究其根本“属于意识哲学而非身体哲学”。<sup>30</sup>

《反思》第二卷第三十章“胡塞尔与他的法国弟子”中，作者则列举出了胡塞尔对于“宗教现象学”的不甚积极的评价——“与我的意义上的现象学毫不相干”“他(列维纳斯)将我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置于同一个层面，因此也就剥夺了我的现象学的本真意义”“……向旧的哲学朴素性的精神回落”“自从我内在的转折发生以来，没有人再与我同行”。<sup>31</sup>如果从胡塞尔的评价出发，简单地认为科瓦雷和列维纳斯等人没有理解胡塞尔，或者认为“宗教现象学”偏离了理性主义，是不公允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胡塞尔想要维护的那种理性主义的特殊性。胡塞尔的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其认为现象学的法国阶段，乃至整个“现象学运动”，都没有跟上他的“超越论转向”，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未经反思的经验性之中，这种“向旧的哲学朴素性的精神回落”导致了误解和混乱。<sup>32</sup>

无论是把现象学奠基于宗教、身体还是此在，对胡塞尔而言都是不够彻底的，因为现象学还原是一种不能停止于某一处的还原，而是“一种我们断然决定采取的习惯的态度，因此绝不是一种短暂的和偶然地个别地重复的活动。”<sup>33</sup>当现象学还原停滞于某种经验性之后，它就失去了其有效性。同时，彻底的现象学还原所给出的超越论现象学，将整个世界的全部都彻底变成了有待考察的丰富“现象”，而个别性的、阻碍性的

29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882页。

30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884页。

31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859-860页。

32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二卷，第860页。

3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90页。

“意见”会妨害对现象的认识。而宗教现象学等后胡塞尔的现象学解释，对于胡塞尔而言，或许意味着要把某种经验作为最高经验而确定下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于他所追求的彻底性和奠基性而言是互相排斥的。

#### 四、胡塞尔的理性主义危机方案

什么是“危机”？用斯蒂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总结，“危机”是现代性在发展到其成熟阶段之后，文化与文明陷入了一种“衰老”和“贫乏”，<sup>34</sup>思想满足于单纯的事实性以及互相孤立的分科化知识。胡塞尔的观点一方面呼应着斯蒂格勒关于思想贫乏的现代性诊断，一方面又超越了《西方的没落》的历史命定论。

当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反对心理主义时，他反对的是现代性哲学对客观真理的不信任；当胡塞尔在《严格科学》中反对实证主义时，他反对的是数据化科学对理性洞见的抛弃；这些反对驱动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试图把“量”的观念的再度“充实”化。把真理消解为“集体共识”和心理习惯，把事物简化为均质化的物体测量和相对化的历史判断，是人类理性过度自我限制的结果。胡塞尔指出，这是由于起源于笛卡尔、发展于休谟、完善于康德的合法性哲学虽然指出了理性的危险和不足，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中的朴素的客观主义，逐步靠近真正的超越论理性并恢复被自然主义所遗忘的“原初的主观性”<sup>35</sup>——最后却没有真正拯救理性，而是被经验主义残余所束缚了。<sup>36</sup>康德恢复了人的主观性，却拒绝了心灵的直接性，否认原初自明的可能，从而使得“理性－世界”之间的直接通道被限制。

胡塞尔认为这种束缚由于两种忽视而造成：没有意识到“生活世界”预设，以及缺乏直观方法。胡塞尔通过讨论认识活动中的“周围生活世

<sup>34</sup>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章导言。

<sup>35</sup>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28页。

<sup>36</sup>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45-147页。

界”指出了认识过程中的被动与匿名是合法的,<sup>37</sup>通过直观方法的赢回取消了康德系统中的迂回性建构而代之以描述性分析,从而把感性和概念重新结合起来而获得了“范畴直观”,恢复了理性能力直接参与世界的可靠性并给出操作方法。对这样一种直接的理性能力的维护构成了胡塞尔哲学的一大主轴,《反思的使命》把胡塞尔对直观和理性直接性的维护称之为“为人的意义而斗争”。<sup>38</sup>通过赢得人的意义,拒绝一个与人无关的世界,<sup>39</sup>胡塞尔给出了一条与现代性危机中思想的均质化倾向作斗争的道路。

而相比于斯宾格勒的《没落》,胡塞尔《危机》中所坚持的理性主义原则也使得他避免了投身于一种“衰败美学”的诱惑。《反思的使命》强调了胡塞尔哲学的危机意识没有走向悲观,是因为胡塞尔意识到与危机密切相关的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绝望以及在世界观中向非理性主义的突变趋向:“理性本身及其要把握的存在者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理解……在这种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现代人,正处于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没因而放弃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巨大危险之中”。<sup>40</sup>一旦抛弃了对危机解决的可能性,人就会同时放弃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而采取更具备诱惑力的方案——例如斯宾格勒美学化和先知式的反理性主义。胡塞尔希望展现出一种明确的规范性且理性的目的论方法,所以,区别于《没落》中对于现代性危机而采取的“接受死亡”的审美性方案,《危机》的主题词汇是“复兴”<sup>41</sup>。斯宾格勒的“命运论”当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审美的历史建构而不仅仅是悲观虚无论调,但是现象学借助对于“原初构建”(Urstiftung)的不断回溯,提供了一种可供实践的历史理性态度。

37 胡塞尔指出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构成了哲学分析的底层,而认识的被动性与接受性使得自我不应该追求彻底的解释而是保留哲学解释中的适当的“匿名”特质,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142页。

38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802页。

39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802页。

40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26-27页。

41 Benjamin Ogden, “Decline or Renewal: Husserl’s Confrontation with Spengle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teriological Teleology”, in: *The Apricot*, (2024): 4,22-43.

在《反思的使命》中，作者注意到以王浩、哥德尔为代表的先验理性主义者质疑《危机》引入历史性是否背离了纯粹的理性；而作者强调，对历史的注意恰恰构成了超越论现象学的重要部分：对于意义构成、内意义结构以及现象学伦理的发生现象学式的补充和完成。<sup>42</sup> 正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在真实的时间中，对于主体性之谜的解决才被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因为现象学主体从来不是孤立主体而是世界中的参与者。现象学把人类历史和自我历史解释为一种有朝向的沉积。在沉积之中没有固定的结论，意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却也不是任意的开始，需要在我们的历史和沉积所给出的方式和视野中开始。我们超越了世界信仰，还试图超越种种累计在我们身上的意见和习惯。但是当我们一旦超越了它们，又会重新开始落入其中，因为那些被悬置的部分不是彻底的“多余物”，而是自我与人类不可轻易放弃的部分；但是，这种返回不是重复和回退，因为经过现象学训练，根本上的转变已经发生：我们不再被唯一地约束在惯性之内，而是保有了一种朝向不同的可能性的能力，通过把生活世界追溯到“原初构建”而从中获得反思与复兴的能力。

由此，我们也可以来回答最后一个本文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胡塞尔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 结语

如果我们简单地说胡塞尔坚持着理性主义，坚持着真理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乐观性，这种结论是不充分的。如《危机》编者前言所述：“即使《危机》一书是以一些使胡塞尔作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继承人出现的论述结束的，这也不应该诱使人们以一种片面的观点去理解他。这里需要做的，宁可说正是领会和理解他的思想的潜藏的多样性。”<sup>43</sup>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胡塞尔关于现象的匿名、自我的断裂、意识肉身性等问题的讨论是其哲学不可被忽视和收编的不安定因素，以至于某种意义上胡

42 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 798-801 页。

4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 9 页。

塞尔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最初的后现代思想家”。<sup>44</sup> 忽视胡塞尔哲学中的“后现代气质”不仅不利于理解胡塞尔本人，也不利于把胡塞尔和丰富多样、具备更多的激进性的现象学运动整体联系起来。

所以，胡塞尔的理性立场不是在一种永恒的传统哲学氛围中被保存的，而是在一种具有张力的思想冲突中被胡塞尔一再坚定选择的。《反思》多次提及胡塞尔思考与写作的痛苦、停滞和怀疑，直接看来这是由于胡塞尔在创作过程中的难产和自我批判；而在更深层次上，这种痛苦正是胡塞尔在反思中不断被思想和时代的多种张力互相撕扯的体现。胡塞尔不仅仅在面对时代的危机，他也在面对自我的危机（或者说这两种危机本就有着同一种来源）——主观感性与客观真理、逻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本质还原和超越论还原、现象本身的自明与不自明、知识结构与自我结构的先验性与具体性……在一片昏暗的处境中不断越过种种自我怀疑和互相冲突，<sup>45</sup> 胡塞尔终于把自己现象学锻炼为一种“在断裂中寻找延续”的“超理性主义”。

描述性哲学家指责胡塞尔回到了观念论，现象学后学不认同胡塞尔的认识论倾向，先验哲学家指责胡塞尔晚年选择了“历史主义”；然而读毕《反思》全书，读者便可以发现，胡塞尔始终没有背离他的哲学理想：他一生都坚持着一种彻底的、奠基性，也是开放性的反思使命。胡塞尔始终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是与时俱进而不断变化的，他不用理性主义固守传统哲学的观点，而是用理性主义面对各种新的现象并扩展理性主义的内涵。胡塞尔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是对现象本身的忠实，而观念论转型是胡塞尔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胡塞尔哲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是找到一种面对世界现象的自我基点，而晚年胡塞尔的历史意识则是基于胡塞尔对世界本身的伦理责任承担以及现象学发生的自然完成。这些看似互相区别的不同侧面实际上共同指向胡塞尔的“乐观精神”：恢

<sup>44</sup> 今村仁司[等]：《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现代思想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sup>45</sup> 胡塞尔这样评价自己的哲学发展：“他对我来说是在我对无把握、不明晰的状态下为了精神的生与死而进行的搏斗：一种完全个人的、尽管与哲学精神性的存在相关的搏斗。”参见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一卷，第1页。

复人类面对物理上急速膨胀、精神上不断萎缩的现代世界的意义性，恢复人类对直接理性能力的认可。这种不断超出自身却又延续了自身的气质，正是“现象学反思”的特征。

在危机化的当下时代，在各种命运交汇之际的历史时刻，胡塞尔“危机－多面－理性”这一特征将会越来越重要——危机（Krisis）意味着挑战、危机意味着转折、危机意味着超越的可能。越是在危机时代，世界越需要一种现象学式 的认识：“世界是我们公共的世界，必然是在存在上有效的”、“关于世界的普遍科学……真理本身的总体”。<sup>46</sup> 胡塞尔不再允许理性再被抽象划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一方面，理性是各种各样的“观看”本身，是一切明证的原初被给予性<sup>47</sup>；更进一步，理性就是理性自身，在这种“理性自身”的内立性（Innestehen）<sup>48</sup>下人类作为“应当－存在”而生活，按照一种先验而具体的原则实现自身理解；最终，在“个人人格”完满的基础上，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整体也应当要达到越来越完满的实现——实现对自身的哲学式理解。<sup>49</sup>

黄政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

46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30-331页。

47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36-§137。

48 内立性是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中形容“本有”的术语，一方面含有自我挺立、自我实现、自我更新的含义，一方面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真理”概念相互联系，指认识整体的自然展开。

49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334-338页。